

## 現實的不現實

● 李朝暉



對「實學」的標榜、強調中國問題的現實性，是《戰管》與大陸其他思想學術期刊的區別所在。正是由於這種「現實衝動」，《戰管》若與「書房被動語態」式的文化思想評論面對中國問題時的自洽和從容相比，要尷尬得多。

《戰略與管理》(北京：戰略與管理雜誌社，1993- )。

《戰略與管理》關注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個領域的重大事件及重大命題，它以實際問題的研究為自己的學風追求，它以建設性地解決問題為自己的學術標準。

以上摘自《戰略與管理》(以下簡稱《戰管》)「稿約」中的文字，可以視為《戰管》的自我期許與自我定

位。事實上，對「實學」的標榜、強調中國問題的現實性，也確是《戰管》與大陸其他思想學術期刊的區別所在。可能正是由於這種「現實衝動」，《戰管》在與現實的糾纏中的欲語還休，若與「書房被動語態」式的文化思想評論面對中國問題時的自洽和從容相比，要尷尬得多。這一點在《戰管》有關民族主義的選題上昭然可見。

90年代大陸民族主義思想的興起，不能說始自《戰管》，但誰也無法否認《戰管》在其間的重要作用 and 地位。粗粗一數，1995-96年間，《戰管》就推出了「變動中的世界格局與中國的民族主義」、「世紀之交的國際戰略觀」、「世紀之交的民族主義」等三個欄目多組專題，成為同一時期對民族主義着力最多的大陸思想學術刊物。一個饒有意味的問題是，民族主義是怎麼冒出來的？

民族主義思想並不起自民間的呼喚和推動，而是出自部分知識人在對時局作出認知判斷後的應對方略。首先，「六四」事件和蘇東劇變，以及1992年開始的經濟熱潮，

是90年代大陸思想界所不得不面對的主要事件。其中，「六四」的意義在於，它使得對現行體制的態度，成為了此後中國大陸思想界最根本的分界線，並成為一切話語和論爭的當然背景；此後「民族主義」之於「全球化」，「後現代」之於「啟蒙」等，概莫能外，都可以於此中窺得若干消息。進而，「六四」的槍聲與蘇東巨變兩者一起使現行體制的存在不再僅僅是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或前提，其本身之存廢也成為一迫切問題。1992年鄧小平南巡，即可看作是對這一問題的應對，即，鄧及其擁護者試圖通過徹底更改體制的一部分以達到保留體制的另一部分，也就是經濟體制的實質性變化與政治體制的依然故我的並存。表面上看，「先把經濟建設搞上去」被廣為接受了，然而，這一意圖以其淺陋直白而流行，卻並未被當代中國最敏感也最深入的思想者所認可，這其中既包括體制的維護者，也包括反對者，儘管他們在對現體制的態度上截然相反。在後者，不僅因為從價值層面而言以自由民主為目標的政治改革不可缺少，也因為在他們看來，根本沒有獨立於政治改革的經濟體制改革一說，僅僅從常識判斷，開左燈往右轉就不能長期奉行。於是，他們認為，民族主義思潮可以被視作有別於鄧小平的另一種挽救體制的努力。在為現行體制尋找存在和延續理由的現實驅動下，所謂的民族主義者認為，經濟發展可以作為階段性的目標，卻並不足以成為支撐一個體制的意識形態，尤其對當代中國之巨大複雜而

言，民族主義作為可能的意識形態，更能支撐一個體制或政權，也更能為之提供合法性的支撐。在此一視角下觀察所謂的民族主義，可以發現其對現實採取了典型的雙重態度：一方面，是對問題深重的國內情勢的漠視或至少是輕描淡寫；另一方面，則是對可能是孤立或偶發的國際事件作過多的聯想和推演，並不乏濃墨重彩，通過對中國國際環境惡化的陳述（諸如銀河號、申奧在事後已被證明是國際腐敗而不是國際政治陰謀，但在當時卻是群情洶洶）以及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對華戰略意圖的解讀，以對未來和他人主觀意圖的揣測為基礎，在無視或忽視更為根本的國內問題的情形下，編織出中國現實和未來的國際生存環境惡劣這一圖景，以此提出對中國國內環境的穩定訴求，並以此作為現行體制的存續理由。這種策略或技巧，在《戰管》編委和主要作者之一王小東的文章中尤為明顯。1995、96年圍繞台灣問題而引發的中美衝突，對民族主義者而言不啻是最佳的現實例證，並因此而使得民族主義浮出水面。民族主義者避而不談台灣問題作為現當代廣義上的中國問題、制度和意識形態選擇的一部分這一層面，更迴避大陸現行體制乃是事關兩岸未來的最大阻力和障礙這一現實，而一味以所謂國際戰略的名義，往國際問題上拉扯，則充分暴露了其虛偽性和幫閒氣。

對此，現體制的疏離者是了然於胸的，全球化論說即可視作對此的回應。但是，事關體制的存廢，

所謂的民族主義對現實採取了典型的雙重態度：一方面，是對問題深重的國內情勢的漠視或至少是輕描淡寫；另一方面，對可能是孤立或偶發的國際事件則作過多的聯想和推演，以此提出對中國國內的穩定訴求，並作為現行體制的存續理由。這種策略或技巧，在《戰管》編委和主要作者的文章中尤為明顯。

統計這幾年《戰管》所登載的民族主義言論與其反面文字之比即可看出，即使不出於編者自身的傾向，來自外部的壓力也會使得《戰管》所搭設的言論和思想平台變得不平。民族主義者在當今中國的喧囂與當局的默許是分不開的，相比之下，他們的反對者就困難得多了。

民族主義者可以奢談其實是政權安全和政黨利益的所謂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在其中雄辯滔滔；全球化的倡導者卻因言論空間的限制，而不得不噤若其言。可以看出，這其實是一場自一開始即不平等的抗爭。由於在市場取向等方面與當局有表面上的重合（實則相去甚遠），民族主義者甚至指責對方與官方合流壟斷話語；而事實上，在事關體制未來等「大是大非」上，是前者而非後者更靠近當局，而依「不爭論」的訓示，體制未來簡直是一個不可討論的話題，實屬禁區，這樣又何來平等的話語權呢？統計這幾年《戰管》所登載的民族主義言論與其反面文字之比即可看出，即使不出於編者自身的傾向，來自外部的壓力也會使得《戰管》所搭設的言論和思想平台變得不平。民族主義者在當今中國的喧囂與當局的默許是分不開的，相比之下，他們的反對者就困難得多了。

對未來在一切方向上保持開放，在筆者看來是思想的起碼品質。強加的限制與自我限制一樣使得思想不成其為思想，或至少是殘缺的思想。缺乏這一點，是中國大陸所有討論當代中國現實問題的人或媒體所不可自我諱言的，《戰管》又何能例外？因此，指出這一點絕不是為了醜化它，因為這正是大陸思想學術的一般狀態；相反，筆者以為，在90年代一派頑主氛圍下，《戰管》堅持對現實的關注至少仍是可貴的，這終歸表示着不能忘情的關懷。

有心的觀察者已然注意到，

《戰管》1998-99年的幾期偏離了《戰管》的既定風格而有了如外界所說的「自由主義」色彩，這首先表現在有更多關於國內現實問題的文章，其次是原本不屬於《戰管》作者群的作者多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與克林頓訪華及北大百年所帶來的自由主義言論環境有關，但是，1998年第4、5、6及1999年第1期，卻已是民主黨事件後的言論寒冷期了，這表明其應不出於投機或是湊熱鬧。聯繫到國內經濟、社會、政治問題的持續惡化，這似乎可以說明國內問題已重新成為知識界關注的重心。如果考慮到此前刊物內部的人事變動，至少可以說，與體制較少糾纏的新一代知識份子，已經開始嘗試真正從現實出發去認識中國問題。

可惜的是，由於《戰管》主辦單位內部的財政因素，更由於本年度國內國際形勢的影響，《戰管》上述從人員到風格的變化很快就過去了。科索沃事件、大使館被炸以及當局有意識的宣傳策略（只需了解一下京城每月主要報刊的主編會議的內容就明白了），從表面上掩蓋了更為重要的當代現實問題：失業下崗、金融風險、腐敗……，似乎民族主義的黃金歲月已然來臨，在此風向之下，《戰管》也不例外；然而，對所謂民族主義者而言，一個不可迴避的困難在於，狂熱的民族主義與對外開放是不相容的。在此並沒有兩全其美的可能。也許正是因為這一困境，民族主義並未被官方接受，也才有了王小東的由民族主義「光榮孤立」向「十步殺一人，千

里不留行」式的非體制反文明的轉向。當然，對以全球化為言說方式的現體制否定者而言，正視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明之間的不平等和衝突仍是必要的，而中國的問題也並不僅僅是體制問題；況且僅體制之變也非易事。對當代中國而言，是沒有任何現存答案

可尋的。處身一個需要智慧的時代，卻無從真正地面對現實，只能在受限中思考行動，這是大陸知識人士的悲哀，更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在現實的不現實中前行，這就是《戰管》對當代中國的貢獻及其所留下的遺憾。

## 公共學術空間的建設

● 楊玉聖



《學人》(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 )。

由著名學者陳平原、王守常、汪暉協作主編的《學人》，是一份大型的人文學術集刊。自1991年歲末

第一輯橫空出世算起，這份由日本國際友誼學術基金會籌備委員會資助、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不定期學刊，大致保持了每年出版兩輯這一相對固定的周期，每輯規模在四五十萬字左右。據筆者統計，截至業已出版的第14輯(1998年12月)，八年之內，《學人》計刊出各類文章三百一十篇，約七百萬字之巨。應該說，即使放眼包括台、港、澳在內的整體中國學術界，這也完全可以說是一項足以傲人的學術業績。

從《學人》所載的文章分析，它主要是以文史哲即人文學科為編輯重心。但就具體篇目及其所涉內容而論，則是古今中西並舉、包羅萬象，其中對學術史的首倡和討論更獨具一格。除「學術史研究筆談」專欄所發的文稿外，它還發表了許多從學術史、文化史或跨學科的宏觀

從《學人》所載的文章分析，它主要是以文史哲即人文學科為編輯重心。但就具體篇目及其所涉內容而論，則是古今中西並舉、包羅萬象，其中對學術史的首倡和討論更獨具一格。